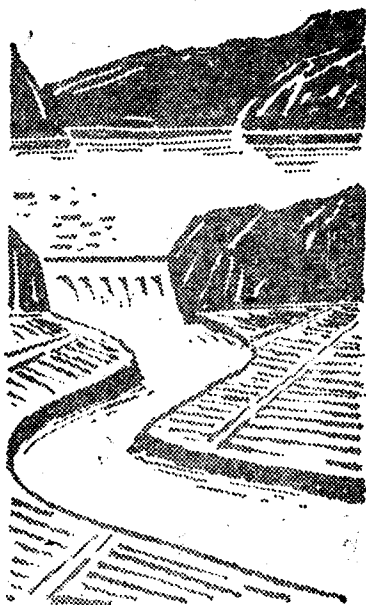


我国科技建设成就故事

万里神州驯水记

郭超人著

125/3



万里神州驯水记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26346



中国青年出版社

726346

万里神州驯水记

郭超人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8印张 140千字

1979年3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册 定价0.52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我国建国二十九年来水利建设成就的青年读物。

作者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以自己在万里行程中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今日愚公”移山填海、重新安排祖国山河的壮丽画卷，讴歌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亿万人民群众和水利工作者在驯水斗争中的伟大胜利。

本书介绍了我国自然地理、地形、气候、水利、水文等方面的知识，作者查证了许多地方志材料，融水利史和水利、水文知识于一炉，内容相当丰富。

还要指出的是，这本书不是简单的事实记录。作者用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历史，纵横几万里的辽阔空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评论我国古往今来治水史的得失，纵观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里人和水的关系，向青年读者揭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只有当人民在社会上由奴隶变成主人，他们才能在自然界真正成为水的主人。

序

在自然界，也许很难找到一种其他的物质，会象水那样赢得人类社会如此广泛的重视和关注吧！

早在多少个世纪以前，科学家们就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实践，把人们对于水的各种认识汇集成浩如烟海的资料和文献。文艺家们也利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将水在人们面前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彩，描绘出多少引人入胜的画面和诗篇。至于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围绕着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下人和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早已作出了权威的论述。

在中国历史上，两千七百多年前的思想家管仲，曾在《管子·地水篇》中说过：“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论证水的重要，就莫过于此了。然而，从社会科学的侧面，探索和研究水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人们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努力还显得有些不足。

其实，水的存在以及人和水的关系，既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教科书，又是一面晶莹的社会的反光镜。它用漫长的画卷，记录下不同时代的面貌，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里劳动人民

的身影。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地上，人们在驯水、用水方面，高奏出多少胜利的凯歌啊！因此，关于水，人们本来可以创造出许多文化艺术的珍品，但是，当祖国的江河上空，翻滚着林彪和“四人帮”一伙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乌云的时候，要求人们写出关于水的优秀作品，那是极其困难的，甚至要冒政治风险。

一九七四年夏天，根据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们组织记者为国庆二十五周年采写了一批通讯报道，其中重点稿件之一，就是反映我国人民在解放后的驯水斗争中获得伟大胜利的通讯《驯水记》。这篇通讯播发以后，尽管全国报刊广泛采用，读者纷纷予以称赞，但是在“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那段时间中，这篇通讯连同其他反映建国以来各方面成就的报道一起，统统被列为“搞右倾翻案”的“罪证”。现在，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两周年以后，通讯《驯水记》的作者在紧张工作之余，居然挤出时间完成了这本系统反映我国人民驯水斗争的长篇书稿，即使是这件事情的本身，就不能不特别令人高兴。

当然，作者不是科学家，虽然他在书稿中为我们介绍了不少科学知识，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他发表什么独特的创见；作者也不是文学家，虽然他也给读者展示了不少感人的描写，但是我们很难要求他塑造出艺术的典型。作者只是一个新闻记者，长时期的新闻实践使他习惯于运用新闻报道的基本方式：认真地调查研究，大量地占有材料，严格地遵

循用事实讲话的原则，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描绘了我国人民和水斗争的惊心动魄的场景，反映了我国人民在水利建设上的光辉灿烂的胜利。同时，由于作者注意把历史背景和现实斗争交错对照，把抽象的数字和生动的形象融汇起来，从全书来看，它运用的是极为简便的新闻通讯形式，反映的却是相当繁杂的古往今来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另外，我赞同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的意见：和我国人民可歌可泣的驯水实践相比，这本书仅仅是一页简单的素描，是一篇简略的速写，它在各方面必然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特别是那种新闻记者很难摆脱的职业病——写作上的匆忙、急就因而显得比较粗糙的痕迹，还是隐约可见。我希望作者不致用“时间紧迫”、“工作繁忙”一类的客观原因来原谅自己，从而在今后的岁月里写出更加成熟的作品来。

在这本书稿即将付印的今天，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滚滚洪流，正全面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一场规模空前壮阔的治山驯水的新战斗，正在辽阔的祖国大地遍地开花。英雄的时代造就英雄的战士，伟大的胜利孕育着伟大的诗篇。不用很长的时间，一部部无愧于驯水英雄的伟大史诗，必将不断涌现出来。这就是我和作者的共同祝愿。

穆 青

一九七八年十月于北京

目 次

第一章	讴歌驯水的新时代	1
第二章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23
第三章	历史性的伟大决战	58
第四章	向“忧患”的“摇篮”告别	85
第五章	扬子江上的大搏斗	114
第六章	牵着龙王的鼻子走	142
第七章	灌区建设的新纪元	160
第八章	沧海变桑田的故事	180
第九章	愚公移山的新颂歌	201
第十章	历史奇迹的创造者	224
难以结束的结束语		243
后 记		246

第 一 章

讴歌驯水的新时代

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曾和水进行过多少次前仆后继的英勇搏斗，留下了多少起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啊！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既爱水，又怕水；既不能离开水，又不能不防水。干旱来临了，人们探寻着水的去向，追逐着水的踪迹，哪里有水，那里就有绿洲和生命，那里就有富饶和欢笑。而洪水一朝泛滥，人们又逃避着水的到来，迁徙到无水的高原或山地，哪里有了洪水，那里就出现饥饿和荒凉，那里就出现死亡和灾难。如果说，人们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得不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同自然界展开年复一年的战斗，那么，在这场长久而艰难的战斗中，水就成为人们利用和支配自然界的主要课题之一。

(一)

翻开一卷卷古老的史籍，透过考古学家对我们祖先活动探索的一件件成果，人们可以毫无例外地发现，哪里有可供利用的水流，那里就有我们祖先定居的遗迹；哪里展开了与水的斗争并且取得了治水的胜利，那里就必定会创

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从距今五十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的“蓝田猿人”，到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从已经出现农业、畜牧业和部分手工业的西安市“半坡村遗址”，到山东大汶口富丽堂皇的墓葬中含铜的骨笛的出土；从标志着生产力发生飞跃的河南安阳的“青铜时代”的艺术珍品，到至今还在世界艺术宝库中光芒四射的敦煌石窟；都集中地分布在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山东等省，正是我国历史上被称为“四渎之宗”、“百水之首”的黄河流过的地方。如果要问：为什么黄河流域会成为我国文化的发祥地？为什么黄河流域会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答案简单得几乎像同义语的反复：因为有黄河，有取之不尽的滔滔河水，有无边无际的沃野肥原，又有人们同黄河、同水土展开的富有成效的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民族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一些阶级推翻另一些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劳动人民不断同自然界、同水进行斗争的历史。

根据有文字可查的史书记载，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洪水，是在所谓帝尧的时候，就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距今已经是四千多年了。在我国的古籍《尚书》的《尧典》、《益稷篇》以及《孟子》、《吕氏春秋》上，都曾简要地描述过当时洪水泛滥的情景：什么“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呀，什么“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呀，总之，“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但是，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滔滔洪水，中华民族不愧为

勇敢勤劳的民族，人们以人定胜天的坚强信念，以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运用人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初步认识，打响了一场伟大而持久的治水之战。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描写的和颧项争帝的共工，其实就是在场治水战争中胜利的英雄。请看：那不屈的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一位勇士用自己的身躯改造山河，使洪水沿着一定的方位奔向大海，使千百万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不正是我们的祖先对治水英雄共工最崇高、最壮丽的讴歌吗？根据我国历史和考古专家的研究，共工既是传说中一个人的名字，也是历史上一个氏族的名字。这个氏族定居在共地，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辉县。奔腾咆哮的黄河闯出群山以后，从这里转了一个急弯，直下平原，烟波滚滚的激流经常在这里泛滥成灾。在黄河边上定居和发展起来的共工氏族，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水经验。史书上记载的“偃”法和“堙”法，据传就是共工氏当年治水的两种基本方法。“偃”字是具备木材的意思，就是用木材壅水的方法；“堙”字是堵塞的意思，就是用沙土堵水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即使在今天治水防洪的斗争中，仍不失为积极有效的应急措施，更何况是在四千多年以前连金属尚未普遍使用的年代。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支配自然界和征服水的能力也不断相应地提高。但是，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正确指出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

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共工氏的治水方法，虽然在一定的范围里，一定的程度上，一定的条件下，挡住了洪水向人们的进犯，保卫了人们正常的劳动和生活，取得了治水的初步胜利；但是，单纯的“偃”、“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不是根治之计。往往，经过一段时间的“偃”、“堙”之后，源源不绝的水流会积聚成一种更加强大的自然力，一旦摧毁人们经年累月修筑的土堤和柴坝，给予人们生命财产造成的破坏，将比“偃”、“堙”以前更加惨重。这就是为什么传说中的“鲧”曾“大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堵水，终于“九载绩用弗成”的原因吧！

从胜利中总结经验，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人们在和水的搏斗中，总是既取得胜利，又遭到失败，在胜利和失败的更迭交替中不断前进。在“偃”、“堙”治水法的基础上，人们又经过了长期艰苦的实践，终于找到了一种所谓“高高下下，疏川导滞”的疏导洪水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出现，不仅使人们征服洪水、控制水患的能力迅速跨上一个新的水平，也标志着人们对水的活动规律的认识产生了一次大的飞跃。而这一切，正是我国社会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一种表现。不断上升的社会生产力把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引向崩溃，而代之以人类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制。作为这个时代鲜明标志的青铜器在生产上的广泛使用，使人对自然界、对水施加积极反作用的手段大大增强，于是“疏九河，陂九泽”等一系列曾是人们对抗洪治水的宏伟设想，开始不同程度地变成现实，从而开拓了我国人民在同水的斗

争历史上烜赫一时的新时代。正是由于人们在同洪水进行的长期战争中第一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才有条件通过艺术加工的手段，为我们塑造了又一位惊天动地的治水英雄——禹的高大形象。

不必像过去的某些考古家那样去讨论禹是否真有其人，也不必花费精力去推敲禹的许多传说是否完全真实。“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禹的崇高形象中，人们可以窥视到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在治水斗争中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从禹的美好传说中，人们可以把握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空前有力地推动了人们治水斗争的发展趋势。请看：父亲由于治水失败而死亡，儿子又勇敢地挑起父亲没有完成的治水重担，毅然地离开结婚刚三天的妻子，和洪水搏斗了整整十三年，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在劳动中总是不避艰险，作出榜样，大腿上累掉了肉，小腿上磨掉了毛，为了千百万人民的事业，完全把自己的身体和家庭置之度外……这难道不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和洪水搏斗的英雄形象吗？再看：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挥动着光照日月的巨斧，一斧劈开了河南境内的伊水流进黄河的入口，一斧劈开了山西和陕西之间的龙门，一斧劈开了贺兰山麓的青铜峡。还是这个巨人，一手整治和疏通了全国九道河川，规划了全国九州地理疆界，为了探寻黄河的来龙去脉，曾登上青海高原，垒起一堆石块作为标志，结果变成了今天海拔高达七千多米的积石山……难道这一切不正是那个

时代在抗洪治水中获得巨大成果的历史缩影吗？

然而，历史以铁的必然性证明，“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奴隶制的出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当然是一个进步，但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看又是一个退步。奴隶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揭开了一个用“最卑鄙的手段”夺取“最卑下的利益”的阶级社会。由于“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使“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求得发展”，这就为这个社会埋下了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

如果说奴隶制在兴起的初期，社会生产力打破了昔日那种分散的狭隘的氏族范围，带来了统一的严密的社会大分工，从而促进了人民抗洪治水事业的发展；那么，当奴隶制发展到一定阶段，奴隶主阶级在政治上的贪婪腐化，在思想上的迷信无能，在生活上的荒淫无耻，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严重阻碍着抗洪治水事业的进步。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的《卜辞》中可以看到，奴隶主要乘舟渡河前，还要叩问上帝是否吉利；在洪水一旦泛滥以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吧妇女投入河底，以哀求河神的保佑。这种在自然灾害面前昏庸退缩的精神状态，能够指望他们组织人们开展同洪水的斗争吗？至于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广大奴隶却被禁锢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据西周《召鼎铭文》记载，当时五个奴隶的价格只等于一匹马加一束丝。在奴隶主祭神的时候，奴隶们常和牛羊一样

被杀死作为祭品；在奴隶主安葬的时候，奴隶们常和牲畜一道被活埋殉葬。在这样的条件下，又怎能指望奴隶们对抗洪治水有所作为呢？虽然，在延续五百年的夏代史料中也能找到关于“凿山穿陵，以通于河”的记载，在经济文化已经比较繁荣的商代六百年岁月里，大量甲骨文中关于井田制的形象描绘，标志着农田水利建设上的沟洫工程的发展，特别是在奴隶制发展到典章完备的鼎盛时期——西周的三百多年统治中，为井田制服务的田间排水系统和灌溉系统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水利建设上的进步。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已经注定，奴隶制愈是到晚期就愈无法为人类的治水事业作出多少贡献了。从商到周的漫长年代里，至今未能找到有关大规模治水活动的资料，根本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吧！

(二)

生产力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它总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使社会经济基础包括上层建筑或迟或早地发生和生产力相适应的革命性变革，从而造就出一代新的文明，包括造就出人对自然界、对水的进一步支配的丰硕成果。从春秋战国之交出现并广泛使用铁器，促进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开始，到统一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的建立，再到汉王朝在巩固和发展封建集权制上的巨大进步，在这仅仅四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水利建设事业规模的宏伟，项目的多样，技术的高超，效

果的显著，在同期世界水利史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且以距今两千三百四十年魏国劳动人民开挖著名的“鸿沟”为例。在今天的河南开封地区(大梁)建都的魏国，人们第一步在汴水到黄河之间开挖“鸿沟”，把滔滔不绝的黄河流水沿汴水河道引到圃田泽；第二步再从开封城北到沙水之间开挖“鸿沟”，使圃田湖水沿着沙水再流入淮河的支流颍水，这就在历史上第一次把黄河同淮河连接起来。丰富的黄河水流不仅保证了魏国境内广阔农田的灌溉，更重要的是为人们提供了往来南北的舟楫和航运之利，使黄河和淮河之间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鸿沟”为中心的交通运输水网，进而把半个中国大陆的一些主要水道联结成为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里，对包括“鸿沟”在内的许多大型渠道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评述：“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饷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再以距今两千二百二十三年在今陕西关中地区修筑著名的“郑国渠”为例。这条连接泾河和洛河的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大型灌溉工程，是秦始皇元年由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工设计和领导修筑的，充分体现了当时我国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卓越技能。今天在关中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显神威的人民引泾渠，它的骨干工程还是在古老的“郑国渠”的范围里修建起来的。“郑国渠”渠首在泾阳县仲山西麓的瓠口，渠干经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白水等

县，然后在大荔县注入北洛河。司马迁对这条渠的评价很高，认为渠成以后，“用注填阡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时亩小，一亩相当于今天零点五二市亩，即使如此，这条渠也能灌溉农田二百万亩。这在两千多年前真是一件伟大的壮举。到汉朝中叶，“郑国渠”逐渐淤塞，一个姓白的官吏又组织人民重开渠道，再引泾水，后世称为“白公渠”。在陕西的许多地方志上，都载有当时群众对这两条渠的歌颂：“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公起后。举耒成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即使在农田水利建设事业高度发展的今天，当人们沿着人民引泾渠畔去追寻那昔日渠道遗迹的时候，仍不能不为我们祖先当年巧夺天工的技艺而发出由衷的赞叹。考虑到泾水流含沙量较大，渠道入口设在泾河凹岸靠近下游的地方，使渠道和河身之间成一定的交角，从而使细沙顺水入渠，粗沙顺河而逝，既用细沙养田，又减少了渠道淤塞，同时还抬高了水位，扩大了灌溉面积。为了免除山洪对渠道的威胁，专门设计和修筑了退水渠道，既保证了水渠的安全，又可以清除渠底的泥沙。特别是主干渠道经过的地理位置选择得恰到好处，使渠水始终沿着渭北高原的一条鱼脊般的拱背淙淙流过，人们可以从渠道两面同时放水，进行自流灌溉。总之，“郑国渠”从设计到施工，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古代水利建设经验的宝贵遗产。

年复一年的治水实践，逐步深化了人们对水的客观规